

楊周公日記



楊闇公日記

楊紹中 周永林 李暢培

編輯整理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成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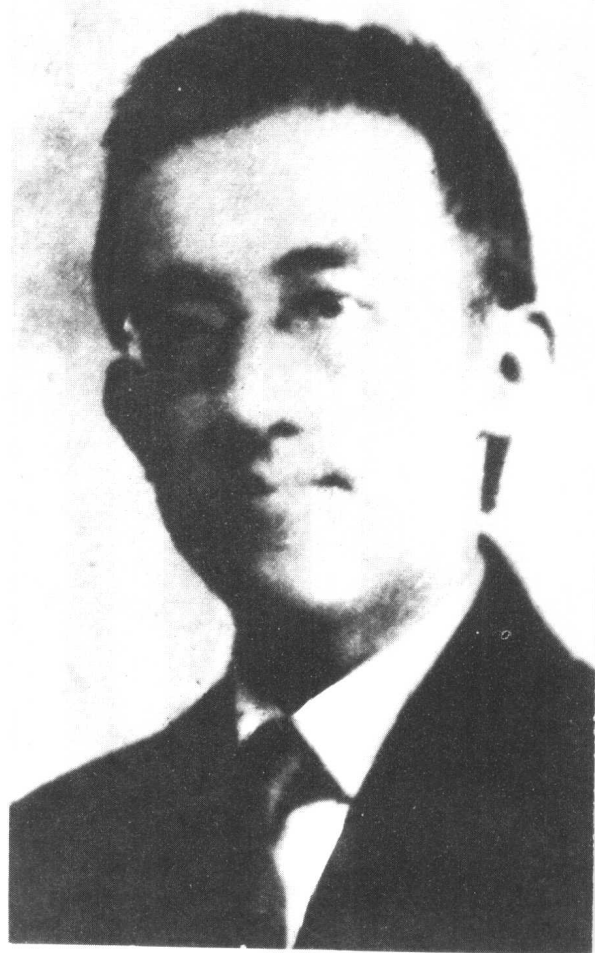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：曾庆华

杨 阁 公 日 记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0.125 插页7 字数169千
1979年11月第一版 1979年11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 1—16,000册

书号：11118·21 定价：1.19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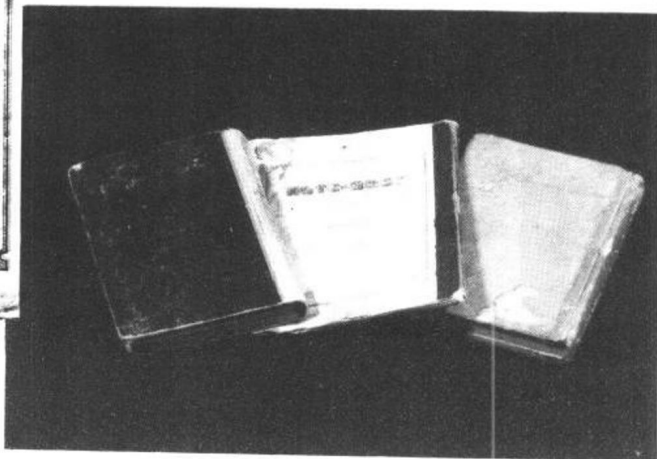
杨闇公同志，一九二六年一月
摄于广州。



杨闇公同志（后右）与吴玉章同志（前左）、童庸生同志（后左）等一九二二年摄于成都。

《杨闇公日记》一九二五年手稿封面。

(A·K·为闇公二字的英文缩写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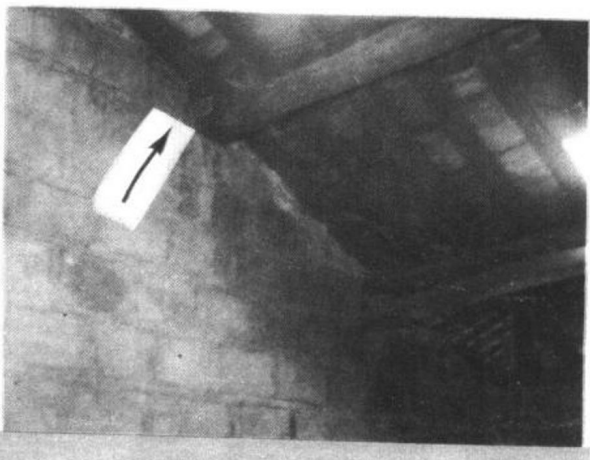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杨闇公日记》一九二四、一九二五、一九二六年三本手稿。



杨闇公烈士遗物——印章和印盒（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杨闇公同志的常用印鉴）。

图中箭头所指处为《杨闇公日记》藏放处。（杨闇公同志牺牲后，他爱人赵宗楷同志避居烈士家乡——潼南县双江镇，曾将日记原本藏放于家中阁楼上梁柱的砖墙洞中。）



《杨闇公日记》手迹之一（日记中谈到的“宣传的报告”即毛主席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）。

今日，会场的情况，非常和平，没有发生任何争执。宣传的报告，事先对此和平至极，都有意外，他不只把宣传的要点说出来，更于宣传的要点之外，把宣传的要点，也带进中央的要点。在会场的人们，拼命地在运动着，一有说出什么话，大家就拍手。我们是在会场的中心，果行会场的中心？

这几天忙得异常，晚上又睡得不安稳，大半夜醒来，看表，不知在几点入睡，他看表，睡去乃，真是苦人！

今日，会场的情况，非常和平，没有发生任何争执。宣传的报告，事先对此和平至极，都有意外，他不只把宣传的要点说出来，更于宣传的要点之外，把宣传的要点，也带进中央的要点。在会场的人们，拼命地在运动着，一有说出什么话，大家就拍手。我们是在会场的中心，果行会场的中心？

这几天忙得异常，晚上又睡得不安稳，大半夜醒来，看表，不知在几点入睡，他看表，睡去乃，真是苦人！

《杨闇公日记》手迹之二。

杨闇公同志在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；刘伯承同志在会上作的军事报告。此两篇报告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大会日刊。

政治报告

军事报告

大会日刊

目 录

序 言	任白戈 (1)
杨闇公烈士传略	(12)

目 记

一九二四年

一月	(25)
二月	(46)
三月	(58)
四月	(74)
五月	(89)
六月	(102)
七月	(122)
八月	(141)
九月	(161)
十月	(180)
十一月	(196)
十二月	(211)

一九二五年

一月	(219)
----	-------

二月 (243)

三月 (257)

一九二六年

一月 (264)

附 录

政治报告

(在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,
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) (285)

工人运动报告

(在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,
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) (296)

农民运动报告

(在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,
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) (301)

在重庆各界欢迎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

代表大会代表会上的演说

(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) (308)

收发信表 (309)

编后记 (318)

序 言

任 白 戈

读了杨闇公同志的日记，不禁感慨万端，哀思难忘。他一生为革命的崇高品质，溢于日记的字里行间，感人至深，令人肃然起敬，衷心景仰。

杨闇公同志，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人。是大革命时期四川党组织的建设者之一，是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地方委员会(以后称省委)书记，中共四川军委书记。他是在一九二七年重庆发生“三·三一”惨案后，被伪装拥护革命，打出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旗号的反动军阀刘湘、王陵基、蓝文彬之流，按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计划逮捕杀害的。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。

闇公同志早年参加革命。他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，改变旧中国的面貌，找寻革命真理，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，成为四川党早期的优秀领导人之一。在大革命时期，他同吴玉

章同志一起，深入群众，宣传马列主义，发展党的组织，培养革命干部，组建了四川全省党的统一组织，广泛地在全省各地开展工农运动和学生、妇女运动，并同朱德、刘伯承等同志一起，开展军事斗争，组织武装起义。同时，他领导了四川国民党的改组工作，壮大了国民党左派队伍，打击了右派；利用军阀内部矛盾，迫使他们不致于公开反对国民革命，暂时保持观望态度，减少革命阻力，解除了四川军阀东下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危害，并从多种途径团结各方面的革命力量，掀起国民革命的高潮，援助了北伐战争。他的功绩不但应当载入四川党的史册，而且应当在我党历史上占有相应的篇章。

阆公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，但他所留下的日记，则永远是我们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。这本日记，记载了他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的革命活动。当时由于他身负重任，工作繁忙，以致日记时有中断。除一九二四年记的是全年外，一九二五年仅记至三月十七日即中断。一九二六年则只记到元月二十五日，这恰是他在广州开国民党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期。就在这一年元月一日的日记中明明记着：“去年的今日，在渝中作局部工作的奋斗，已觉有应付不暇的样子，今年竟负了十百倍于去年的国民革命的整个的重

任，……只有拚命的努力，以求尽我应尽的职责！”因为此后吴玉章同志即留在国民党中央工作，四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导工作，都交给阎公同志负担。这部日记虽然记的日子不多，但却真实地反映了烈士的革命斗争生活，纪录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四川党早期的组织活动情况。它不但对研究四川党的建立、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史料，而且对我们整个中共党史的研究，也有很大的价值。同时这本日记也是宣传、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，激励人们继承先烈遗志，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的好教材。读者从日记中必将得到很多教益。

阎公同志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，但他早在青少年时代，便能以清醒的、敢于正视现实的头脑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去观察国家大事。他看到了国内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，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我国横行无忌的情况，对于这种腐朽、黑暗的政治局面，极为不满，从此便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，多方寻求，摸索革命的真理和解救祖国的道路。

为了“进新学、增知识、广见闻”，他毅然挣脱了封建族长的种种束缚，远到南京和日本学习军事，参加了一系列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的斗争，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。当时，由于还没有找到马克思主

义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，所以，他参加的革命斗争都没获得胜利。一九一九年“五四”爱国运动爆发，推动了我国知识界的觉醒，一些先进分子认识到，要解救苦难深重的中国，只有走俄国的道路。閻公同志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，在日本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，奋不顾身地参加了支援国内“五四”运动的斗争。这时，他已开始从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，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了。在一九二四年元月一日的日记中，他写到：“这一般幸运儿的伟人们（指借辛亥革命爬上政治舞台，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妥协的地主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），足足闹了十二年，仍然是没有具体的办法……吾国自辛亥改革后，算是骤进共和，民人的程度实与共和相去很远，兼辛亥以前的旧有势力者并未打倒，所以才有这十二年的纷扰。”又说：“现在训练出来的后进者及……家，很不乏人，我怎么不乐观！”这里表达了他对旧民主主义的批判，和对革命未来充满信心。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，閻公同志在政治上逐渐成熟。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八日的日记中叙述了他“心内有一种起伏不定的问题，欲指导群众，究竟从那条道路走的好？并思及目前的环境，究竟应取种什么方法才打得破？”他承认“象这几种问题，萦绕我心久矣！前者

刻已认定马氏为主（即马克思的革命学说），独后者很难得适当的方法。”这时，阎公同志虽然已和吴玉章同志等在成都组织了青年共产主义（简称YC）的马克思主义组织，但由于当时四川交通不便，消息闭塞，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，不知道党的革命纲领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所以他仅认定要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，而还不知如何走法。及到是年六月，阎公同志从成都到上海会见恽代英等党员，受到党的教育。在日记中他以敬佩的笔调称赞恽代英同志“谈话很有一部份真理存在。他研究的方法都是从实际入手，不是象他们光唱高调，漠视一切，故我很有动于中。他非常注重向民间去的工作，与我所主张的很相同。”又说，“代英对于现社会的情形，一定了解无余，故很重视行动的工作。”他在返川的轮船上又读了唯物史观等书籍，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。这样，他在思想上发生了一个飞跃。回到重庆，他筹建了党的地方组织，深入开展各种群众运动，由于他能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实践，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，所以终于锻炼成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出色的领导人。这就是杨阎公同志所走过的革命道路。过去一般的革命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亦大体与此相同。这里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：一个人革

命不革命，要走什么道路，并不取决于他的家庭环境和出身成份，而在他有没有为国为民牺牲的大志，和孜孜不倦探求革命真理，勇于革命实践，把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求实精神。这对每个有志于革命的青年，特别是出身于剥削家庭的知识分子都具有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閻公同志具有一心为革命，公而忘私，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。他早年参加革命，到加入共产党以前，作为一个革命者，他为了解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不顾个人安危，积极投身于反对军阀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斗争，曾经多次遇险和被拘捕，都没能丝毫动摇其坚定的革命意志。他一九二四年说：“十余年来出生入死者四次。”他真是一心扑在革命上竟忘了个人的一切。这种可贵的革命精神，在閻公同志的日记中处处皆是，跃然纸上。他为宣传马列，讲解主义真谛，不辞辛劳，深入动员群众，组织群众，以至置个人身体健康于不顾。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，川东师范学校邀请他去讲演，事后他写到：

“连夜不眠，疲乏到极点了……。辞不获已，只得强力支持去说说，把讲题说了一半。精神已来不及了，声气也嘶了……。那可爱的青年们，只准我休息三十分钟，无论如何要我讲完……。无法，只得再说下去。”

又一次，他上午带病工作，当晚写道：“午后许多同志来寓，请示办法，与他们谈至八时许。他们去后……诸妹的同学们（八人）因在寓留宿，要我为渠等谈目前思潮的变态和应走的路，强应其请，与之一谈。……不觉谈至一点。……一时三十分才睡，浑身寒气已遍，咳得非常的厉害，加以头也有些作痛。” 閻公同志这种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，一心献身革命的共产主义崇高品德，是一切革命者的楷模。

閻公同志的知人之明和对同志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，也是非常突出的。大革命时期，閻公同志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四川的共同领导人，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，他能知人善任，团结同志，组织革命队伍，壮大革命力量，克敌制胜，发展革命大好形势，这充分表现他作为革命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成熟。他与刘伯承同志的相知和给予的评价，便可清楚看出来。一九二三年，閻公同志在成都与伯承同志相识。次年，他在日记中记着与伯承同志谈入团事，说，“他的答复，最足使人起敬：‘见旗帜就拜倒，觉得太不对了。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，正拟极力深研，将来始能定其方道’”。相谈之下，閻公同志赞不绝口，说：“这是何等的直切，何等的真诚哟！比起那因情而动，随波而靡的人来，高出万万倍。”又说，“此后，拟设

法使其从本方向走，若能达目的，又多一臂助。”

当他记到刘伯承同志要赴犍为县，他送行出成都南门，至武侯祠，又写道：“如象伯承这样的人，实不可多得的了。……伯承去后，我觉有依依不舍的情境，他送了我一张像片，当珍藏之”。他对伯承同志十分敬佩，成为至交。经他介绍，伯承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一九二六年冬天，他与伯承同志在四川军阀部队中发动领导了顺（庆）泸（州）起义，震慑了四川军阀，纷纷易帜，表示拥护国民革命，解除了他们东下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威胁，对巩固当时国民革命的大好形势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我们一些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，更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他这一突出的高贵品质。他对同志的爱护和关怀常常比对他自己的亲兄弟还要深切，所以他能把四川党组织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，在大革命时期，领导群众，战胜了国民党右派和军阀反动势力，革命获得节节胜利。

閻公同志深入实际，联系群众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，亦值得一切革命者很好的学习。他经常穿着一身褪色的旧西装，领带都是黑色的，生活很简朴，但他对群众的生活疾苦却特别关心，比自己为重。他经常利用开会、走访等多种形式，调查民情，了解各阶层群众的思想动向。群众都很尊敬他，亲近他，愿意